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 主办

# 海洋史研究 【第八辑】

Studies of Maritime History Vol.8

李庆新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第八辑】

# 海洋史研究

Studies of Maritime History Vol.8

李庆新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洋史研究. 第8辑/李庆新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 - 7 - 5097 - 7855 - 5

I. ①海… II. ①李… III. ①海洋 - 文化史 - 世界 -  
丛刊 IV. ①P7 - 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3382 号

## 海洋史研究 (第八辑)

---

主 编 / 李庆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张晓莉

责任编辑 / 叶 娟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75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855 - 5

定 价 / 89.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 aerial photograph of a coastal area, showing a body of water in the foreground and a shoreline with some buildings and a boat in the middle ground. The image is slightly faded and has a blueish tint.

广东省社会科学  
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 主办

## 《海洋史研究》学术委员会

- 主 任 王 珺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 顾 问 滨下武志 Takeshi Hamashita (中山大学)  
蔡鸿生 (中山大学)  
邓开颂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耿 昇 (中国社会科学院)  
姜伯勤 (中山大学)  
梁志明 (北京大学)  
苏尔梦 Claudine Salmon (法国国家科学中心)  
杨国桢 (厦门大学)  
叶显恩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周振鹤 (复旦大学)
- 编辑委员会 包乐史 Leonard Blussé (荷兰莱顿大学)  
陈春声 (中山大学)  
黄良民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纪宗安 (暨南大学)  
李塔娜 Li Tana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普塔克 Roderich Ptak (德国慕尼黑大学)  
松浦章 MATSUURA Akira (日本关西大学)  
吴志良 (澳门基金会)  
张国刚 (清华大学)  
章扬定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 主 编 李庆新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 副 主 编 周 鑫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 责任编辑 陈贤波 徐素琴 罗燧英 杨 芹 周 鑫  
王 璐 王一娜

# 目 录

## 专题论文

- 早期亚洲陶瓷贸易和勿里洞唐代沉船遗物 …… 约翰·盖伊 (John Guy) / 3
- 十五世纪中期菲律宾潘达南岛沉船的水下考古  
…………… 欧塞比奥·Z. 迪桑 (Eusebio Z. Dizon) / 17
- 迈向“大分流”：中欧贸易网络和全球消费者  
在澳门和马赛 (18~19 世纪) …… 马龙 (Manuel Perez Garcia) / 32
- 从王直和德瑞克的个人命运看 16 世纪中英两国  
在对外贸易政策和官商关系上的不同 …………… 张 丽 / 48
- 明治前期日本产人参的输出动向及其出口产业的形成 …………… 童德琴 / 67
- 十八世纪在广州的法国商人和外交官 …………… 耿 昇 / 87
- 1760~1843 年广州外国人居住区的商业街  
…………… 范岱克 (Paul A. Van Dyke) / 104
- 关于《亚马港全图》的若干考证 …………… 金国平 / 124
- 再探十九世纪香港的德国社群 …………… 麦劲生 / 132

清道光前期(1821~1839)广东对海难救助之研究

——以欧洲船只、船员为例 ..... 郭嘉辉 / 149

清道光后期(1840~1847)广东中路海防建设

——以九龙城寨兴筑为中心 ..... 巢娟 / 172

简论12世纪以后南部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

——兼论中西海洋观的差异 ..... 陈衍德 / 202

明清时期环珠江口平原的生态环境

——兼谈海洋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方法 ..... 吴建新 / 217

明清时期香山海陆环境变迁与农业开发 ..... 袁海燕 黄仕琦 / 237

清代香山县基层建置及其相关问题 ..... 刘桂奇 郭声波 / 250

元明小说与其他文献里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 普塔克(Roderich Ptak) / 268

澳门妈祖信仰的形成、扩展及其与中西宗教的交融 ..... 吴宏岐 / 284

妈宫故事和海岛历史

——以妈屿岛近四百年变迁为中心的考察 ..... 陈嘉顺 / 315

## 学术述评

“海上丝绸之路与明清时期广东海洋经济”

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 王潞 / 337

后 记 ..... / 347

征稿启事 ..... / 349

Manuscripts ..... / 351

# 专题论文





## 早期亚洲陶瓷贸易和勿里洞唐代沉船遗物

约翰·盖伊（John Guy）\*

东南亚海域是历史上亚洲贸易和交换的主要区域。不可避免的，这片海域也是沉船集中的地方。在考古发现的早期和中世纪亚洲贸易的所有商品中，陶瓷是保存最好的。

借助于考古发现，我们对于亚洲陶瓷的认知，以及对于历史上海洋贸易和航海技术的了解，都得到很大的扩展。1987年，笔者发表了《东南亚的陶瓷遗迹：一份初步的地名录》<sup>①</sup>。文中列出了100个地方，其中只有8个是海洋考古遗址或者沉船遗址。在此后的16年里，我们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至少25个可确定的沉船遗址，当然还有许多是尚未报告或等待发掘的。对于东南亚历史研究而言，海洋考古的意义越来越受到重视，也直接促进了东南亚水域考古发掘的发展。进行发掘的包括沉船所在国家的考古机构，或是一些与沉船归属国合作的探测公司。

目前，沉船考古方面又增加了一艘新发现的沉船，以及它所装载的大量船货。该船的沉没位置已被考古记录，而它对于中国和东南亚历史、陶瓷艺

---

\* 作者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南亚与东南亚艺术馆主任研究员，译者杨芹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审校者陆鹏亮系大都会博物馆研究员。本文为2001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东方陶瓷学会年度讲座报告的缩减版。该沉船在印尼勿里洞岛（Beilitung）海域被发现，因发现处有一黑礁石，故常被译为黑石号沉船（Batu Hitam shipwreck）。

① J. S. Guy, *Ceramic Excavation Sites in Southeast Asia: A Preliminary Gazetteer*, Adelaid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1987.

术史及收藏鉴赏历史的重要性是可以想见的。早期亚洲贸易的一个永恒主题，就是中东宫廷和中东文化对中国釉陶和瓷器的需求。这种贸易不单涉及舶来品和奢侈品等高档领域，价格低廉的商品或日用品同样占有重要分量。早期沉船船货的发掘和研究，对于理解不同商品的意义以及人们需求的水平和品位的转变等，都是最好的证据。

## 早期中国外销瓷

早在公元2世纪或3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陶瓷已经输出到汉朝的领土之外，或者一些附属地区，例如亚洲中部、越南乃至更远的地方。相对零星的考古发现，表明当时的陶瓷贸易还是十分有限的，大抵只是朝贡或奢侈品贸易的一部分。但考古记录也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在75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陶瓷外销从有限的奢侈品贸易转变为系统的订制生产和出口。中国陶瓷贸易增长，成为亚洲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内容。到了晚唐和五代时期，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中国的远距离贸易开始转向南海上的海洋贸易，并有所扩展。<sup>①</sup> 一些港口如三佛齐（东南亚赤道附近）的兴起，见证了这种海上贸易的繁荣。这些港口既为远距离贸易服务，也从中获利。商业贸易的财富无疑促成了东南亚一些城市政权和小王国的出现，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宋元时期。<sup>②</sup>

这种一开始在外交等意义上进行的贸易行为，不久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随之引起了朝廷的重视。伴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朝廷在东部一些港口相继设立了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市舶使）。714年，市舶司在广州首设，随后在宁波和泉州相继设立。<sup>③</sup> 在波斯—阿拉伯世界，也长期存在一个具备类似功

① J. S. Guy, *Oriental Trade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Ninth to Sixteenth Centurie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② J. S. Guy, *Tamil Merchant Guilds and the Quanzhou Trade*, in 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Maritime Quanzhou, 1000 - 1400*, Leiden: Brill, 2001, pp. 283 - 317.

③ Wang Gungwu, *The Nanhai Trade.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1, Pt. 2, 1958, Singapore (reprinted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8), p. 100.

译者按：关于唐代市舶使、宋代市舶司之建制，至迟在唐开元二年（714），唐朝已经往广州派遣市舶使，市买番舶货物，初为临时差遣，后逐渐成为常置，机构名为“市舶使院”。终唐之世，广州之外，明州（即宁波）、泉州并没有设置市舶使。北宋开宝四年（971）平南汉，置市舶司于广州，以广帅尹崇柯、潘美并兼市舶使。其后于杭州、明州置提举市舶司，统于转运司。元祐二年（1087），始于泉州置市舶司。两宋市舶，以广东、福建、两浙三路为最重要。

能的机构或职官——沙班达尔（港长、港务官）。他们管理贸易和外商，负责收税并与当地政府保持联系。中国的市舶使有可能是以这种港务长为参照的。

中国的陶瓷，主要是越窑青瓷、白瓷（所谓的“萨马拉器”）及彩绘瓷（长沙窑），大部分通过阿拉伯商人特别是从波斯湾来的商船进行运销。这个时期中国外销的瓷器最常见的是湖南长沙地区的彩瓷。整个海上陶瓷贸易路线沿岸都发现有这种器物，这条路线从唐朝的主要港口宁波起，延伸至东南亚大陆和海岛，再到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波斯湾地区。这种连续的考古分布，喻示着中国外销瓷的开篇。

7世纪左右，阿拉伯帆船已经在进行从西亚到中国的远距离航海。这也构成了“辛巴达（Sinbad）传说”的来源。巴格达、巴士拉和尸罗夫（Siraf）的巨商从事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冒险活动。阿拉伯人在亚洲海上贸易中占有优势的一个例证是阿拔斯王朝的金币第纳尔（Dinar）在贸易中被当作基本的交换媒介。从695年创制到11世纪中国货币取代其地位，第纳尔一直发挥支配作用。

阿拉伯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发挥作用的另一个例证，是大量波斯湾蓝釉陶器碎片与唐代外销瓷器同时出土。这种陶器可能是在伊拉克沿海的巴士拉地区制造的，由此可见当时双向的贸易交流包括来自外部——斯里兰卡、泰国半岛、爪哇中心、泰国低地和越南中部等地区。<sup>①</sup>近年来在中国东部港口地区也发现大量这种伊斯兰器物的碎片，最多的是在江苏扬州——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喜欢的港口城市之一。

商人苏莱曼（Sulayman）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对这种贸易往来，包括对商品的国际需求的描述最早也最完整。中国需要贾夫纳（斯里兰卡北部城市）的珍珠、古吉拉特的棉、马拉巴的胡椒以及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香料。阿拉伯国家喜好中国的丝绸、陶瓷、漆器和铁制品。该书也展示了9世纪中国瓷器外销的情形。显然，不同类型的中国陶瓷都很受欢迎，浙江越窑和龙泉窑青瓷已享有国际声誉，还有河北定窑的白瓷及彩绘长沙窑器。此外，福建和广东沿海窑口，也生产一些仿照浙江、江西和湖南制品的、等级较低的瓷器，其成品便于运往邻近港口。广州附近地区也烧造并外销一些特别的陶罐，树立了 this 港口城市在中国早期瓷器贸易中的地位。

<sup>①</sup> S. Setudeh-Nejad, The Significance of “Persian Context” Discoveries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ailand and Southeast Asia: A Concise Perspective, *The Silpakorn Journal*, Vol. 33, No. 6, 1990.

## 826 年的勿里洞唐代沉船

9~10 世纪，中国经东南亚前往印度和西亚进行国际贸易的情况多见诸中国和阿拉伯的文献记载，而考古发现却付之阙如。最近在西爪哇海勿里洞发现的一艘 9 世纪的沉船（载有约 6 万件商品），则改变了这一境况。该船于 1998 年和 1999 年在印尼海域获准进行考古发掘打捞。<sup>①</sup>

最重要的发现，便是这艘船的归属问题。水下考古很清楚地显示，它并非中国船只，它不像中国船只那样有多重的铺板，使用铁钉或使用隔舱。考古队对于船体的初步勘探，揭示船壳采用捆绑和缝合技术，全面填塞船缝以防水，以及有用铁和石头混合制成的船锚。所有的特征都表明这是一艘中世纪阿拉伯帆船。船体发现时很完整，长 15.3 米。<sup>②</sup> 它与哈里里编撰的《玛卡梅故事集》抄本（1237 年，波斯湾瓦西特镇）里所画的阿拉伯大三角帆船最为相似（见图 1）。

再结合上文关于阿拉伯在亚洲贸易中所扮演角色的讨论，确认这艘唐代沉船的身份应无太大问题。不仅如此，这也是在东南亚海域发现的第一艘阿拉伯帆船。因此，对于过往反映阿拉伯商人和商船支配地位的历史记载，这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考古实证。

这艘满载货物的唐代货船从广州启航前往东南亚，大抵会在东京（越南）<sup>③</sup>、占婆<sup>④</sup>的诸多港口及环泰国湾的船只中转站停靠。许多为这种贸易服务的陆上运输点和转口港已被确认，例如兰波（Laem Po）、克拉地峡上的

① 感谢海底勘探公司，允许笔者研究勿里洞沉船及其船货并使用相关图片，但未经笔者许可，这些图片不得使用于其他地方。

② M. Flecker, A 9th - century Arab or Indian Shipwreck in Indonesian Water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Vol. 29, No. 2, 2000, pp. 199 - 217.

③ 译者按：今越南中部以北地区，唐代属交州，治所龙编（今越南河内）。10 世纪以后，交州地区独立。15 世纪越南胡朝以西都（今越南清化省永禄县安孙乡）为京城，以旧都昇龙（河内）为东都。1430 年，后黎朝改东都为东京。郑阮纷争时期（1533~1788），欧洲人、日本人称北部以昇龙为中心的郑氏统治区为东京（Tonkin），南部以顺化为中心的阮氏统治区为广南（Qu'ang Nam），或称“交趾”“交趾支那”（Cochin China）。

④ 译者按：占婆，中南半岛之古国，故地在今越南中部及南部部分地区。原为汉朝日南郡象林县地。192 年前后，区连称王建国。陈寿《三国志》称之为林邑，唐代称占婆，至德年间更名环王。3 世纪国势日盛，疆域北与越南横山（今越南义静省境内）为界，南抵大岭（今越南富庆省境内），与柬埔寨为邻，西界老挝、柬埔寨，东濒海。10 世纪以后长期与越南相攻战，15 世纪中叶以后国势日衰。1693 年被广南阮氏吞并，国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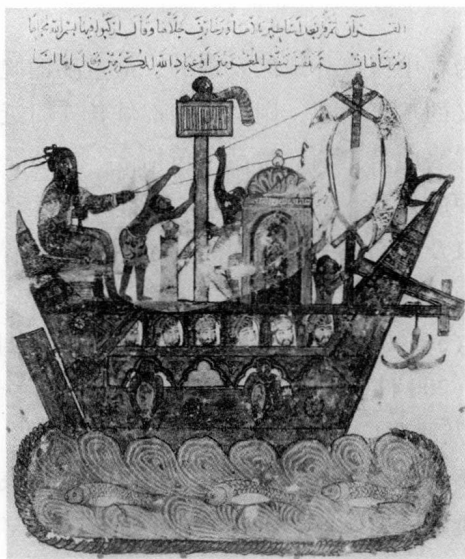


图1 哈里里《玛卡梅故事集》(1237年)

注：插图中为阿拉伯大三角帆船。船壳采用捆绑和缝合技术，装有三角帆。该图描绘了乘船驶往印度的阿拉伯商人（巴黎国立图书馆提供图片）。

差也 (Chaiya)。中国的货物在马来半岛的东部沿岸被卸下，然后被装船运往西部沿岸，再前往西亚市场。供给东南亚顾客的货物则通过二级贸易网络再发散出去。唐代沉船第一次展示了9世纪中国陶瓷通过西瓜哇海域进行的一次大宗贸易。在今天看来，这艘船可能计划在西瓜哇这个著名市场上先卸下庞大瓷器船货的一部分，以满足这个市场对瓷器的需求；然后再通过巽他海峡前往印度洋，去往斯里兰卡及更西的港口。

沉船身份的确认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同时，船货的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也使这次发现意义非凡。它是在中国以外的同一处地方发现的、装运船货最丰富的9世纪早期中国外销瓷器及金、银器最集中的考古发现。这些珍贵的金属制品包括10件金器、24件银器、18块刻字且之前没记录过的银锭和30块铜镜。这些重要的发现，以及一系列其他制品——成套的铜、铁和铅器，2件玻璃瓶，1件漆盘，1个墨盒，墨和香料等，暂不在这里讨论。<sup>①</sup> 本文主要关注在沉船上发现的瓷器，特别是对它们的生产来源（窑址）进行更细致的

① 参阅 *The Belitung Wreck* (待刊)。

研究。

这批船货可视为在中国以外地区发现的、最重要的晚唐制品的集合。中国国内具有同样意义的重要发现，则是唐朝都城长安附近的法门寺在 874 年掩埋的器物。但它代表的是王朝的赠品，包括金、银器，上乘的丝绸和进口的玻璃器以及越瓷中的佳品。<sup>①</sup> 作为在同一处的集中发现，唐代沉船对于理解晚唐的物质文化以及唐朝工艺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有着特殊的贡献。

在沉船位置出水的 6 万多件物品中，陶瓷占了 98%。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湖南长沙的瓷器（56500 件）。也有少量来自其他地区的陶瓷，如可能来自浙江越窑的青瓷（200 件）、可能来自河北定窑的白瓷（350 件）、白釉绿彩瓷（200 件），以及一些广东窑口烧造的青瓷粗品。

沉船中的白瓷质量很高，胎体及釉色洁白，它们代表了早期外销陶瓷中真正的高温瓷器。最好的白瓷可能出自河北的邢窑和定窑。主要为餐具，包括盘碗（见图 2）、杯子托盏、盖罐（见图 3）和玉璧底碗。其他的白瓷可能出自另一些窑口，研究认为可能出自河南巩县窑。<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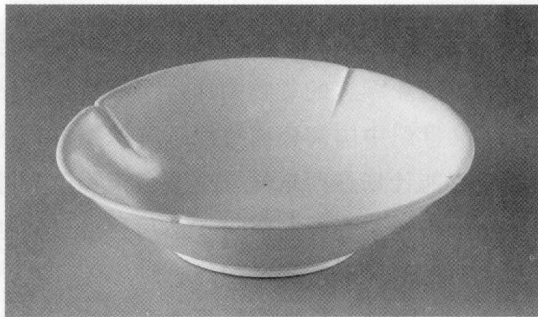


图 2 白瓷花口碗，河北邢窑或定窑出产，勿里洞船货，9 世纪早期



图 3 白瓷盖罐，河北邢窑或定窑出产，勿里洞船货，9 世纪早期

青瓷则有两类。一类质量较高，可能为浙江越窑青瓷（见图 4），有些则可能与洞庭湖东北的岳州窑有关，要明确窑址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沉

① 新潟县立近代美术馆：《唐皇帝からの贈り物》，东京：博报堂，1999。

② Fan Dongqing, Early Ding Wares in the Shanghai Museum, *Orientalism*, February 1991, pp. 259 - 264.

船上这种类型的绿釉瓷的原型在扬州—宁波港口地区也有发现，表明9世纪时浙江与这种瓷器有关。<sup>①</sup>

另一类是在广东生产的、在出口贸易中用作容器的大陶罐（见图5）。它们可能是在广州周边的一些窑口生产的。从广州珠江流域发现的陶罐证实了它具有装载船货的功能。<sup>②</sup> 其典型特征为高身、窄颈、肩部有系，施绿釉不均。这种罐在海上贸易路线沿途遗址多有出土，常被称为“杜珊”（Dusan）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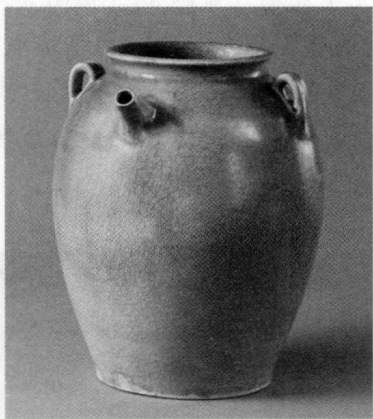


图4 青瓷水罐，可能是浙江越窑青瓷，勿里洞船货，9世纪早期，高22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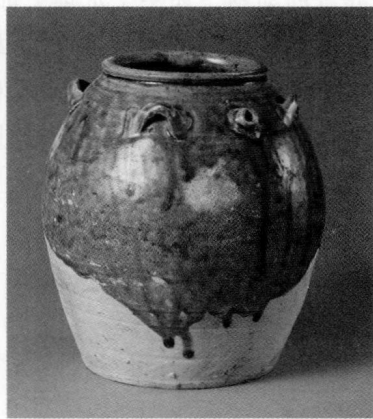


图5 青瓷水罐，可能是在广东生产，勿里洞船货，9世纪早期，高25厘米

波斯湾尸罗夫大清真寺的地下曾发掘出这样一个罐，在烧制时间上跟沉船上的陶罐接近，可确定为820年。<sup>③</sup> 它们与爪哇同时代的几个考古遗址如中爪哇的寺庙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爪哇发现的一些这样的罐上带有仿阿拉伯文铭记，证实这些器物生产背后的商业性质——提供给中东市场，正如

① 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年第6期；蒋华：《扬州出土的唐代陶瓷》，《文物》1984年第3期。

② 这些文物陈列在广东省博物馆，也可见冯平山博物馆等编《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85。

③ D. Whitehouse, *Chinese Stoneware from Siraf: The Earliest Finds*, in N. Hammond (ed),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London: Duckworth, 1973, pp. 227–283. 另参阅 M. Tampoe, *Maritim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Ceramics from Siraf (Persian Gulf), 8<sup>th</sup> to 15<sup>th</sup> AD*, BAR – S555, Oxford, 1989。



尸罗夫大清真寺的发现。<sup>①</sup> 在勿里洞唐代沉船中，这些罐子被用来存储香料（八角的存在已被确认），更重要的是，它也用于堆放长沙碗及其他碗。这是一种海运包装的方法，可以使许多低温烧制的、脆弱的器物得到保护。

勿里洞沉船遗物中 200 余件白釉绿彩瓷更是令人震惊。从小执杯到大水壶，从盖盒到大盆、盘、瓮、罐以及带流杯（见图 6、图 7），数量可观，款式丰富。这批白釉绿彩瓷烧制手法大胆，富于创新，和当时的许多陶瓷一样，无论在细节还是构造上都直接效法金属器具。<sup>②</sup> 手柄和喷口都饰有异域的动物，如一个水罐上饰有豹和水生动物（见图 8）。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高达 1 米的细颈龙嘴水罐，圈足如盛开莲花，器盖为张嘴龙首。该器以伊朗金属器为原型，突破材质的技术限制，诚为陶瓷艺术之杰作（见图 9）。同类绿彩瓷器上也多见大尺寸作品，另一件大盖盒，直径达 38.5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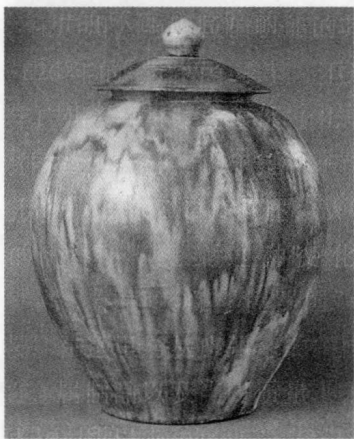


图 6 白釉绿彩瓷，勿里洞船货，9 世纪早期



图 7 白釉绿彩带流高足杯，可能为河南巩县窑出产，勿里洞船货，9 世纪早期

① S. Adhyatman, *Notes on Early Olive Green Wares Found in Indonesia*,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 Jakarta, 1983, pls 10, 13. Whitehouse D., *Chinese Stoneware from Siraf: The Earliest Finds*, in N. Hammond (ed),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London: Duckworth, 1973, pp. 227 - 283.

② M. Medley, *Metalwork and Chinese Ceramics*, London: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1972.